



编者按：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本期读书为大家推荐先生们案头的几部别致小书。画册的图像里无声讲述着女作家武将军的飒爽一生，优美的音乐随笔里有力传递着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式话语表达。一起通过“先生的书桌”去看——

案头的山水

从飞蛾扑火到云端之星

□ 郭冰茹

推荐图书

荐书人：郭冰茹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玲画传》
李向东 王增如 著
花城出版社



▲《永远的丁玲》
中国丁玲研究会
常德丁玲文学创作
促进会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荐书人：肖艳平
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响堂：音乐博物馆掠影》
张振涛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女性写作的关注者以及在课堂上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教师，丁玲是我特别熟悉的作家，她是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任何一个维度都绕不开的讨论对象。我读了不少丁玲的其他女性作家，我更喜欢萧红凌厉而有质感的文字，张爱玲华丽而又苍凉的故事。至于丁玲，沉淀在我心里更多的却是她这个人，她的性情性格、她的人生选择。当然，你也可以说文如其人。

前段时间在丁玲的故乡常德参加研讨会，主办方特意赠送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向东、王增如写的《丁玲画传》，一本是中国丁玲研究会和常德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主编的纪念画册《永远的丁玲》。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丁玲的一生。翻看书中的老照片，丁玲的一个个生命瞬间扑面而来，我此时的心灵触动一点儿也不亚于当年读文献时的情形。

从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处女作《梦珂》，到1986年主编文学刊物《中国》，丁玲的文学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史，而她的文学创作、她的人生选择以及她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之路也紧随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在丁玲开始写作生涯之前，她曾辗转长沙、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地求学，她如此记录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域。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在那张1923年她与好友王剑虹的合影中，两个年轻的女学生挽着手、搭着肩、同握着一个小花篮，眼里的光芒和脸上的笑容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丁玲

成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女作家。莎菲叛逆、倔强甚至有些任性。她不臣服于旧秩序，在爱情游戏中奉行“我要使我快乐”的原则，渴望品尝胜利或占有的快乐。法国学者吉尔·里波韦兹基在《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中说，女性在恋爱中的位置是以个人主义的要求为基础的，是与现代的自由、自主、自我肯定这些观念相融合的。换言之，爱情是女性获得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五四”一代将自由恋爱视为个性解放的代名词而为之奋力呼号，那么显然，已经脱离礼教旧家庭的莎菲并不满足于此，得到了爱情并不意味着找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她只能选择到南方“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

丁玲在1927-1930年间创作了许多莎菲式的形象，《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薇薇、《他走后》中的丽娜、《日》中的伊黎、《自杀日记》中的伊黎等，这些形象被茅盾称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们成为彼时时代肖像的一部分。虽然文本中的莎菲们彷徨、苦闷，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出路，但现实中丁玲却已将写作视为自己安身立命，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1928年，蔡元培之女蔡威廉为丁玲画了一幅肖像画，名为《女作家丁玲》，丁玲微微侧身，眉目舒朗炯炯有神，脸上透着一股自信和执着。

1931年初，胡也频牺牲，留下手足无措的丁玲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是这一年，丁玲在冯雪峰的鼓励下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随后也写出了被誉为“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水》。《水》之所以被称为“新小说”，既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丁玲此前“莎菲式”的主题、趣味和人物形象，也是因为标志着丁玲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丁玲写作的转向固然与胡也频的牺牲直接相关，但也离不开想要摆脱写作困境的焦虑，因为她已经将时代青年苦闷的

内心生活铺陈到了极致，相同的主题再写也超不过《莎菲女士的日记》。冯雪峰曾经这样总结丁玲的转变：“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才是真的出路，并且也和以往的恋爱热情的追求联接的起来的，因为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史沫特莱为此时的丁玲拍过一组肖像照，她坐在木椅上，倚着靠背。一张是她一手搭在椅背上，一手托腮，侧脸上扬，目光朝向远方；另一张是她双手交叠伏在椅背上，眼睛斜斜地平视过去。两张黑白照片里，明亮的光线打在脸上，现出温和的轮廓。丁玲的目光虽然都避开了镜头，却毫不犹疑。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对写作的执着，对自己抱定的人生信念的坚守，丁玲于1936年辗转到了延安。她是当时到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毛泽东特意填了一首《临江仙》相赠，其中那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形象地概括出丁玲两个不同的生命阶段，而“武将军”所蕴含的飒爽豪迈、坚忍不拔、执着顽强也成为了丁玲后半生的气度或写照。翻看《丁玲画传》和《永远的丁玲》1936年之后收录的照片，不论是1938年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宣传抗日时一身戎装的半身照，1956年在颐和园撰写申诉材料时倚靠廊柱的留影，还是1978年重获自由后与陈明在山西长治漳头村的合影，不断变化的背景里，不变的始终是那一缕坚定而执着的眼光。

瞿秋白说冰之（丁玲又名丁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孙犁说丁玲是“几度隐现云端，不失其光辉的星”，说的都是丁玲性格中的那份执着与坚守。丁玲写下的文字和关于丁玲的文字早已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丁玲，而图像则让丁玲飞蛾扑火的勇气和终成云端之星的光芒更为鲜活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式表达

□ 肖艳平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族群、民族在地化的音声表达。在1877年留声机尚未发明前，声音不能复现，音响未被记录，音乐博物馆是我们了解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贾湖骨笛、河姆渡骨哨、曾侯乙编钟、唐代大曲、宋元杂剧时，厚重的历史总能让人自信满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人开始以西为师。随着学堂乐歌的推行，中国音乐学子与音乐家哼的是外国调，唱的是外国谱，说的是外国词。在西洋音乐面前，从事中国音乐的作曲家似乎忽然矮了半截。在中国音乐圈，用外国理论表达中国音乐、用外国词来阐释中国音乐已是普遍现象。手边的《响堂：音乐博物馆掠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于2022年出版的一部音乐随笔。这是一部中国音乐家以中国式话语、中国式表达，带有中国式情感的学术性随笔文集。

该书共分两部分：一是走进乐器博物馆，二是走近博物馆乐器。文集共收录作者撰写的19篇文辞优美、笔调轻松、思想深邃的文章。

中文“博物馆”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词汇，也是一个“舶来文化”。“音乐博物馆”“乐器博物馆”等主题馆的名词则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个翻译过来的词汇，生硬呆板，完全不像中国名词中表意与表象相结合的特征。为此，作者以“响堂”一词冠名文集的名称，其中既指家乡的一座小山名字，也含《汉书》中乐器“填乎绮室，列乎深堂”之意。在中国人习惯

以“顾名思义”思维理解下，成了一个既有历史维度，又具想象空间，还包含丰富情感内涵的名词。书名是全书基本内容的总概，篇名是统领各文内容的核心。作者不仅在书名上有着细致考量，在篇章命名上也体现中国式文学表达。他写参观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的文章是以“于无声处听风鸣”为名；在看完巴黎音乐城拾音设备后，取了“沉默是金”的题目；在参观完日本滨松市博物馆后，写下了“钟万石可撞”的文章标题。看完外国人的乐器博物馆后，作为中国音乐学家，不论感慨系之或是若有所思，只看标题，满眼都是中国式语言的品评。此外，在内容上，对《资治通鉴》《战国策》《文心雕龙》《古文观止》《聊斋志异》《通典》《乐书》等经典著作的引用，也是其中的亮点，形成了兼具学术性的睿智与浪漫式的抒情的特色文字。

中国传统音乐的叙述从来不是生硬的说理，而是擅长寓教于乐的形式，喜欢以叙事性阐发道理。在“响堂”中，除了叙述自己的经历，作者还谈了自己的游历故事。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曾有一次解读、展示编钟演奏的实践经历，硬生生地把代表香港大学“孤独的风笛”的“劲头”压了下去。这既是以散文笔调叙述个人有趣经历，更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故事说明在中国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东西方乐器产生的文化“碰撞”，以及“碰撞”后的最终结果。中国的传统文化表达，不仅长于理性叙述，更擅长感性的立体表达。他说“鼓衣”：“敲着再也无人缝制

的‘衣裳’，好像看到刚刚放下针线活的村姑，红袖掩口，远眺斜倚‘鼓衣’腰鼓汉子加入‘社火’行列。那不是‘鼓衣’，是一袭‘天衣’！香风扑面，包裹着余韵渺渺。”文字中有了色彩，有了画面，甚至有了味道。说博物馆教育：“老师把藏在展柜中的乐器拉出来，让木石张嘴，让金石为开，让打了蔫般的非洲鼓滚出生命波涛，让被软的簧舌颤动，让孩子们活蹦乱跳于节奏之中。于是，孩子活了！乐器活了！博物馆也活了！”文字中说的不仅是活泼场景的现场描述，甚至一系列不重样的动词把读者的心都写“活了”！中国惯有的表达不仅强调文辞优美与表意顺畅，表达的形式还强调文字节奏。作为中国音乐学家的张振涛先生深谙表达之道，文章中出现了各种具有中国式的“韵文”表达。在说观看乐器与触摸乐器的不同时，将之比喻成“敲着”和“摸一朵”的区别，他说：“敲它、摸它、挪它、嗅它，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打量它、测量它、记录它、琢磨它，深度和重量，记录和认知，浸渍有日，嵌在部件和细节中的概念就慢慢出来了”。这种带有重复性且具有明显节律性的表达，不正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呆板”吗？这种喷薄而出的表达，看之顺眼，读之顺口，听之顺耳。

费孝通说：“在我们传统里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白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在“响堂”中，所见之处大量体现出家国之情。作者以回望学

习、工作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乐器陈列室”为起篇副标题，以“那个与生命无数次交汇的地方”为主标题。该文以陈列室的古琴、箜篌、瑟、三弦、坤琵琶、潮州大锣鼓、火不思为线索，叙述了与中国音乐研究所相关的其人其事，他将杨荫浏、曹安和、孔德庸、刘东升、肖兴华等一一列举。于作者而言，中国乐器陈列室无疑是他作为笙管乐研究专家的起点之“家”，而这本身又是“花了几十年的工夫从全国收集到无数宝藏的第一座‘中国乐器陈列室’”，具有国家象征。作者以“说起来难过，说起来伤心，说起来欲哭无泪，一脸无奈、感慨系之的情绪”谈到它。这就是年届七旬的学者以个人经历回望时，这种“不清不白”的家国情怀使然。这种情怀不是瞬时，而是在整部文集中交织。这种家国界限的“不清不白”，其实就是一体化、有着这种中国式的家国一体化情感，作者才能在文字中凝结出如此深情的表达与深邃的思考。

一般而言，一本有深度的好书往往具有明确的对象性，一本普及性读物往往具有对象的广泛性。该书从内容上给予音乐学界在乐器学研究领域的思考，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也是一部看得懂、学术性随笔。从作品表达上，我认为该书不仅为学者，也为一般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如何以中国视角看音乐，如何以中国的表达方式叙述音乐的范例。

因此，我向大家推荐张振涛先生的《响堂：音乐博物馆掠影》。



故纸堆里挖出意外收获

□ 李伟明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祥瑞宝莲》出版之后，不少读者关切地问我是否还有续集。实际上，在写《祥瑞宝莲》时，我就已谋划了下一部——姊妹篇《风云宝石》，故事在《祥瑞宝莲》一书已埋下伏笔。小说以赣南的某个历史事件为背景，借助若干真实的历史人物，架构一个通俗的故事，重点宣传赣南有开发价值的文化符号或风景名胜。《祥瑞宝莲》的具体事件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钟明亮在赣州起兵反元，宣传的重点是赣县宝莲山；而《风云宝石》的历史事件，则是七年之后的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刘六十在兴国县聚众起义，重点想推一推兴国县的宝石山，兼颂赣县蔡九坳和瑞金铜钵山、罗汉岩等文化符号及风景名胜。

刘六十起义在当时的赣南绝对是件大事，也是江西行省的大事，在全国有影响。刘六十的具体情况，已没有更多的资料可考，只知道他不久即失败被杀了。关于这场起义，根据《元史》记载，刘六十在赣州(兴国)起兵反元建国。朝廷遣兵镇压，主将观望退缩不敢出战，而地方官吏又扰害良民，于是刘六十的势力更加壮大。正当省里官僚都不肯去赣州惹这个麻烦之际，身为行省左丞的董士选主动请缨前往赣州，而且即日启程，不带兵卒，只带了兩名随从李霆镇、元明善，大家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董士选到了赣州境内，不急着率兵去前线打仗，却先来个肃清，将那些祸害百姓的贪官污吏逮捕治罪。到了兴国县，离刘六十盘踞之地不到百里，董士选让有关将领分路驻守待命，对煽动造反的人进行惩处。老百姓也不喜欢战乱，董士选所作所为让他们感到这世道原来还有王法。结果，董士选没过多久便抓获了刘六十，对其手下则遣散回去种田。

我发现，董士选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是个治世能臣。史称董士选平生以忠义自命，特别讲究廉洁，无论门生部属，无人敢以一丝一毫敬献给他。他还非常重视家风家教，家人也以廉而名，“子孙不异布衣之士，任者往称廉吏云”。因其德高望重，当时的皇帝元成宗尊称他为“董二哥”，他父亲董文炳曾被称为“董大哥”，可见董氏家族在当时之显赫。同时，我发现董士选的“秘书”元明善，也是个人物，后来做了高官，与张养浩、曹元用并称为元朝“三俊”。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恢复科举考试，“明善首先考中”。及廷试，又为读卷官，所取士后多为名臣”。延祐二年，全国发生了一文一武两件大事。“文”即恢复科举考试，“武”即因朝廷实行“土地经理”而引发了宁都的蔡五九起义。没想到，元明善居然是恢复科举后的首批考官。

顺着刘六十起义这根“藤”，摸出了这样的“瓜”。这些知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让我更加兴奋，成为笔端涌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和情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风云宝石》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董士选、元明善在赣南的故事，我借这个机会把他们从故纸堆里打捞出来，传播开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赣南历史上曾经的震撼与精彩。

很多人认为，通俗作品尤其是武侠小说，无非是打打杀杀的消遣品而已，上不了大雅之堂，也谈不上什么“深刻意义”，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无论哪种文学形式，都有条件也有责任体现思想价值，关键看作者聚焦主题的深刻性。当收获的历史背景超出意料，写作无疑就可以往深处多走一走了。于是，我除了尽力展现赣南风土人情、历史人文、景观物产，更在刀光剑影的背后，想到了为政之道、为官之道、为人之道，想到了如何挖掘历史逻辑中的时代价值。如果只是写一场农民起义，写官兵与义军之间的斗争，故事情节难免落入俗套。小说与史实毕竟是两码事，我笔下的刘六十与董士选纯粹是文学形象，所谓“武侠”也只是一种表现方式。我的真正想法，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说说某些至今还未过时的道理，希望以这种轻松的形式注入若干思考。

2023年2月，《风云宝石》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市，两个月发行就超过两万册，5月再印。2023年3月1日，百道网发布了2月好书榜，《风云宝石》入选文学类好书榜。4月14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影响力书单”，《风云宝石》入选文学类。这种行业报的评选，对我们圈外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鼓励。作品能受到市场认可，无论如何，让我感到欣慰，这也是我继续写作的动力。

目前，《风云宝石》关于罗汉岩的内容，已完成剧本改编，正在筹拍网络电影。这部电影将全部取景于赣南瑞金。我知道这样的作品当然谈不上“成熟”，它依然只是个尝试。作为一个赣南作者，我希望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本土历史上曾经有意思的事情挖掘出来，让今人知道我们脚下这块看似平常的土地，其实也是大有故事的。一个地方的历史，可能蕴藏着许多闪光点。只要用心去读它，总是会有收获的。



▲《风云宝石》
李伟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